

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

杨超 何雪松

内容提要 尽管社会工作一直以来都有重视关系的传统,但尚未发展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关系理论。本文在批评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关系传统的基础之上,立足中国的关系研究,阐释以关系主义为出发点的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关系世界”是构成这一关系视角的概念连续谱,是社会工作实践框架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关系视角 社会工作 关系链 关系网络

关系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内容,贯穿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始终。中国是一个格外重视关系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作用尤为突出,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即便如此,社会工作界尚未发展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关系理论。将社会工作之中的“关系”理论化,进而实现理论体系化,这既是实践的需要,亦是贡献内生理论、推进专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将对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理论脉络、哲学基础和理论框架做初步的探讨,并结合实务案例进行阐述。

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理论脉络

从社会工作的关系传统出发,立足于中国语境的关系研究,可以发现,我们需要走向一个整合的关系视角。

(一) 社会工作的关系传统

传统上,社会工作的诸种理论都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客体关系理论以关系研究著称,克莱因认为弗洛伊德的客体是表示关系的,天生指向客体的;费尔贝恩进一步指出自我有建立关系的内驱力;马勒总结了关系的发展规律四个阶段

(何雪松,2007)。沙利文的精神病学是人际关系的科学,强调人类的社会性本质和人类适应人际关系的潜力(沙利文,2010:1-5)。伯恩开创的交互分析理论强调人际沟通交流(Berne,1975)。由此可以看出,英美的社会工作关系传统总是绕不开根深蒂固的弗洛伊德思想。后续的系统理论、生态理论、叙事理论、优势视角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

过去十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初步的关系理论。2004年Folgheraiter出版了“Relational Social Work: Toward Networking and Societal Practices”,这代表西方社会工作学者对建构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的重要尝试。他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的某些实践模式割裂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它不但强化了正式福利体系的责任和服务使用者的福利依赖,也降低了个人借助非正式资源寻求改变的可能性(Folgheraiter,2004)。Freedberg(2008)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社会工作的关系理论,但这个理论框架是初步的。在第二版中,Freedberg(2015)引入关系-文

化的视角,但没有摆脱精神分析的框架,过于微观取向。Smith、Doel 和 Cooper(2015) 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来考察了关系,但还没有真正实现从个体到关系的转变。Rosenberger(2014) 编辑的论文集讨论了针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关系社会工作实践。但总体而言,以上的理论建构都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理论传统,没有充分重视社会理论这一丰富资源。

(二) 社会理论的本土关系研究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梁漱溟(2005: 84) “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理论判断,是早期面向中国关系理论的经典性研究,并影响了后续学者研究。

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的华裔许烺光提出“情境中心”概念,他认为美国人是自我依赖的个人中心生活方式,中国是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的生活方式(许烺光,1989)。他所提出的心理社会均衡(PSH)理论,认为人是心理社会的平衡体。PSH的核心概念是“基本人际状态”,展现了许氏理论的最独特的视角就是将人理解为一个“场”而非独立的个体。其次,许氏理论是一个心理社会整合的理论,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视角。这对于整合心理学、社会学理论,构建中国性的关系理论有积极意义。台湾学者杨国枢指出了国人的社会取向论点。社会取向的特征包括四个: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他人取向。家族取向显示了家族的优先性。关系取向的几个特征包括:关系形式化,中国人是在关系网络中界定自己;关系互依化,强调回报,尤其人情与面子资源;关系和谐性;关系宿命观;关系决定论,家族之人采用责任原则,熟人采用人情原则,生人采用利害原则(杨国枢,1993:99-110)。权威取向包括权威敏感、权威崇拜、权威依赖特点。他人取向主要特征在顾虑人意、顺从他人、关注规范、重视名誉。这在操作层面反映了国人的行动准则,提供了关系理论的实践指南。

黄光国一方面提出了“儒家关系主义”,也启示我们从关系主义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的关系理论。另一方面,黄光国还分析了具体的关系实践。每个人都构建一个关系网,而每个关系网络又有重叠,共同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正是这种网络,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人行为方式。混

合性关系是最能体现中国人“人情”“面子”的关系,中国人以礼尚往来方式维系这种混合性关系,以人情法则而非公平法则来给予特殊帮助(黄光国、胡先缙,2005:166)。与之类似,翟学伟(2011)指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关系网都是共同存在的东西,差别在于关系网的构成与个体在关系网中流动,而中国人则喜欢运用人情来构建和运作关系网。中国人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的三位一体(翟学伟,2013:102)。关系运作的三个命题是情理并重,关系秩序的建立和空间上同一性的一再强化(翟学伟,2013:306-307)。边燕杰(2001,2004)总结了三种中国关系主义理论模型,一是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二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三是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的观察,边燕杰(2010)认为,对这个现象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许是探索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念、中国社会学学科方向、社会学的中国学术流派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

(三) 走向整合的社会工作关系视角

纵观以上理论,从传统的个体视角转向关系视角,是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一个脉络。关系社会工作是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口。中国是一个关系性文化的国家,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中国有着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资源,关系理论也因此可能是展现中国贡献,输出世界知识的重要路径。研究关系视角的社会工作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们看到,总体上,学界的关系社会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

以社会工作为立足点,我们认为,需要走向一个整合性的关系视角,汲取社会工作与本土语境下的关系研究资源,并充分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社会工作是面向弱势群体为主的学科,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应以弱势群体的关系研究为重点。其次,从理解性的关系理论走向干预性的关系理论。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解释性关系理论,有必要转换成可操作化、应用于实践的理论框架。其三,连通偏重微观的社会工作关系传统和偏重宏观的社会理论关系研究,并加入特定文化维度。如此,推进理论的整合,从而发展内在一致的关系视角理论。其四,在以上基础上,构建出包括哲学

基础、概念框架和实践框架的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架构。这一架构是系统的,从而形成一个可能的理论框架。

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哲学基础

20世纪兴起的关系主义为多门学科所引入,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在此,我们重点讨论关系主义的内涵,并引出“人即关系性存在”作为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理论起点。

(一) 关系主义

西方社会理论中对关系主义最热心推广和彻底贯彻的是布迪厄的理论。人类的语言适合表达事物和状态而非关系和过程,容易突出实体而忽略关系,导致了学者们常在二元论中进行抉择。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转换成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的对立,是危害社会学的毒瘤般的主张(布迪厄、华康德,2004:16)。实际上,现实从未是一元论或者二元对立的,现实是存在于关系之中的。布迪厄因此主张拒绝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整体主义、情境主义。关系的首位性是布迪厄的思想特色。他以此发展了两个重要的关系性元概念:场域和惯习。场域是拥有某种引力的关系构型,是各种位置之间的一系列的客观的历史关系所构成的;惯习是积淀在个人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的身心图式(布迪厄、华康德,2004:17)。

关系主义与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亲和性。在黄光国(2009)看来,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来解读中国显得怪异,应当以“关系主义”连结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关系主义”为预设,构建含摄文化的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国需要从西方的二元对立转向关联的思维,帕森斯所谓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不过是连续统的极端假设(翟学伟,2011:66-68)。这种视角不仅是研究传统问题的方法,对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研究依旧适用。从更大的范围讲,从关系角度思考问题是亚洲文化的特点,但是作为方法论的关系论应当成为一般知识,为知识贡献智慧(何友晖、彭泗清,1998:35)。从关系出发,而非个体的角度的思想方法就是方法论的关系论。分析的单位应该是一般关系中的个人和特定关系的人们,而不是个人或情境,社会互动的特点就是相

互性(何友晖、彭泗清,1998:35)。从逻辑方式上讲,就是要从传统的理性走向关系理性,现实的人是与自我发生关系并同时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关系中的个体(贺来,2015:30),个体乃是“为他人的主体性”。

(二) 社会工作的理论出发点:人即关系性存在

关系主义与传统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个体与关系的优先性。关系主义视角下,我们研究和看待个体需要放在关系中,关系是第一位的。换言之,人即关系性存在。关系性存在所要表明的含义在于,在社会中存在的行动者必然是关系性的,唯有关系性的行动者才能存在于社会。“关系性存在”说明了关系的彻底性,也是理解案主生活世界的出发点,构建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理论起点。

关系主义下,社会工作中案主个人的问题并不存在,而是案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问题。关系主义坚信在共在的平等关系中人才得以生存、成长、实现人生意义和幸福(高尚涛,2010:132)。这意味着,案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是共在关系或者我一你关系失衡的问题。由此,社会工作的干预将面向关系结构中的排斥他人、自我孤立以及追求过多独占利益的行为与姿态,并且积极创造最优的共在关系结构。

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探索性理论框架

“关系”是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中心概念,关系理论框架的建构首先需要对关系概念展开分析。

(一) 关系概念的操作化与体系化

潘光旦先生曾提出“社会学的点线面体”,这可以成为构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基本线索(何雪松,2015:43)。受此启发,本文从点、线、面和体四个层次来重新认识“关系”,提出一个关系概念的连续谱,从而将“关系”操作化和体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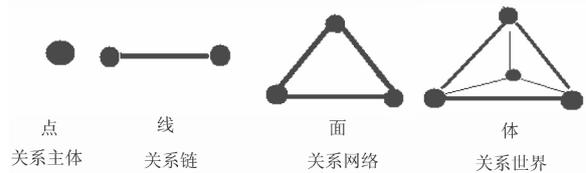


图1 关系概念连续谱

我们认为,可以将关系操作化为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关系世界四个层次,分别是关系

的点、线、面、体四个层次。

关系主体,是参与关系的个体。主体是关系性的,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存在主体性;主体也具有建立关系的倾向,主体的本质也因此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这与前文所述的关系主义是一致的。关系链概念的提出受益于柯林斯(1998)的仪式互动链理论。关系链呈现线性关系结构,尚未形成网状。它是关系主体之间沟通、互动的结果。关系网络是关系链编织所形成的社会网络,费孝通先生描述中国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边燕杰(2010)总结的中国人以“熟亲信”划圈子观点也是在关系网络层面的分析。关系世界是关系网络在历史中不断生产宏观的结果,是加入时间维度的关系网络的累积。它随着时间而演化,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就体现为政社关系的调整与变动。

关系概念的四个层次呈现递进性,对于后一个层次的讨论总要牵涉前一个或前几个层次的讨论。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和关系世界构成了关系的概念体系。由此,我们可以将前述断裂的微观与宏观的关系理论脉络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合性的关系概念,从而为社会工作的实践框架提供理论基础。

(二) 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聚焦:关系网络

关系是一个跨越多重学科的概念,不同学科对关系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关系的连续谱中,心理学侧重的是关系主体,而社会学侧重于关系世界。本文认为,对于社会工作来说,关系网络则是主要的研究与工作对象。首先,这将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社会学区分开来,划出适合自身的领域。关系网络可能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属于社会工作自身的对象。其次,关系网络对个体与社会的双重聚焦,是化解当前个体与社会纷争的一个可能路径。从国际上看,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工作实践过度关注临床实务,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有名无实,饱受批评。关系网络在关系的连续谱中处于联结微观与宏观的桥梁位置,是一个连通个体与社会的纽带。社会工作聚焦于案主的关系网络,既要有临床的实践,也需要有宏观的社会关怀才能实现。

那么,从关系网络的角度看,案主问题是如何产生呢?中国人强调相互依赖情境中心生活方式(许烺光,1989)或者说人与环境的融合(杨国枢,

1993:91)。行动者乃是一个心理社会平衡体,从关系网络的意义上来说,案主的问题是关系网络的动态平衡出现了问题。西方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中,关系网络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即关系网络结构和关系网络资源。由此言之,案主关系网络的不平衡会涉及到关系网络的结构问题和资源问题,表现出整体的关系网络弱势,正如有研究(赵延东,2007:12)指出,弱势群体的网络结构规模较小,网络同质性强,通过关系网络可以动用的资源少。

弱势群体的关系网络弱势使其在压力事件的冲击下,产生了各类问题。关系网络是一个展现参与者关系力量不断斗争、动态的过程(布迪厄、华康德,2004:135-136)。在某一时间段内,关系网络是相对平衡的。然而,内外部力量的变化要求关系网络必须应对由此带来的震荡,如果应对得当则重新保持平衡;反之则导致关系网络的扭曲。当然,在关系力量的推拉变动中,关系主体自身的力量不能忽视。在面对风险或危机时,案主的主体性“缺席”,能动性的掩盖,以至于无法胜任处理关系网络变动的能力,只能任由问题产生。

(三) 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实践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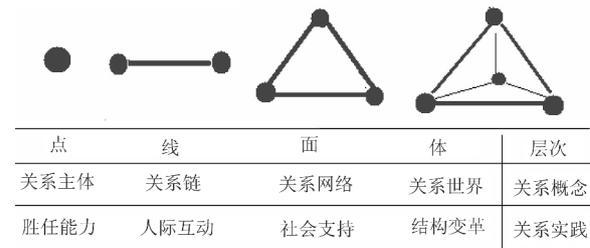


图2 关系实践连续谱

关系概念连续谱的提出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面向关系的实践,我们需要将这四个层次的关系概念转化成行动层面。本文认为,与关系概念的连续谱相对应,关系的实践包括胜任能力、人际互动、社会支持、结构变革,它们指明了关系视角下社会工作干预的方向。胜任能力的概念来源于生态视角理论(何雪松,2007:90),包括自我效能感、人际关系能力、动员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能力,以及做出决定以获得其他想要结果的信心。胜任能力是综合性能力,涵盖面向关系链、关系网络和关系世界改变的能力。胜任能力是判断关系主体主体性的方式,通过胜任能力建设,关系主体

的主体性得以复归或增强。关系链形成、维持的基本方式是人际互动,互动是人际关系的主要行动策略。作为人类的独特行为方式,互动也是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整合的纽带,其基本内容包括谈话、倾听和观察(特里维西克等,2010:102-109)。正是通过互动,人际关系得以建立,而且互动以胜任能力为基础。社会支持是在胜任能力和人际互动基础上,社会网络结构使用后的结果。基本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家庭支持、同伴支持、社区支持等。社会支持的动员既要推进社会支持体系搭建,也要动用其中的资源,因此也包含社会资本的意义。关系世界的实践需要政策和制度的变革,代表社会结构的变革,这是宏观社会工作的价值目标。社会工作的发展体现了政社关系的历史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社会工作推动转型的宏观使命,反映了社会工作的结构视角。

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实务案例分析

笔者通过对上海司法社工领域的四名资深社工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典型案例资料。为了便于阐述,本文分别选取四个案例有所侧重地展现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关系世界的实务干预。

(一) 关系主体的干预

案主鸿儒,今年77岁,沪上著名高等学府首批硕士研究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赴欧进修留学人员,为国争得荣誉。研究所退休下海经商,后因职务侵占罪被法院判处社区矫正。鸿儒坚持不认罪,全家人流露出对生命的绝望,计划想用集体抱团自焚的方式以示清白,有较大的重新犯罪风险。(案例1基本情况)

从关系视角看,案主鸿儒的问题是关系网络失衡的结果。关键点在于鸿儒自我关系的失衡,由此导致鸿儒与亲朋好友断绝联络,家庭关系出现失衡,社区关系更加冷漠。因此社工的干预主要方向在于鸿儒这个“关系主体”。鸿儒对司法判决充满怀疑,从而产生心理、情绪问题。真正让鸿儒发生改变的是社工丽俪通过自己的人脉联系资深律师。这位律师对鸿儒的案件作了详尽地分析,耐心倾听鸿儒提出的具体问题,做出解释,初步解开了鸿儒的心结。国人的关系取向特点之一是权威依赖性(杨国枢、余安邦,1993:128)。虽

然丽俪做社工之前也从事法律工作,对鸿儒提供法律咨询,但这不足以令鸿儒信服。之后,鸿儒自学法律,提起民事诉讼寻求股东权利的保护,最终胜诉。鸿儒的民事纠纷转败为胜,证明了鸿儒自己的能力,提升他的自尊和自信,鸿儒认知发生明显变化,懂得自我调适心态。进而,鸿儒自我心态的调整,直接促进了他所在家庭关系网络的良性运转。妻儿为他感到自豪,在他的积极心态影响下,家庭情绪稳定,社工进一步协调了邻里关系。由此,以对鸿儒这个关系主体的关键干预为主,兼顾关系网络其他部分的调整,鸿儒的关系网络得到良好的调适。

(二) 关系链的干预

案主阿林,25岁,因抢劫罪进行社区矫正。阿林悔过意识强,积极参与社区矫正;阿林的母亲也十分配合,希望儿子能够尽快回归社会。但阿林所在社区,尤其是居委会对阿林的态度不好,性格暴躁的阿林也常因此懊恼,有重新犯罪风险。(案例2基本情况)

阿林关系网络中不平衡的关键点在于阿林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问题。这属于“关系链”的层次。社工怡姝先是多走访居委会,与居委会干部沟通。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传递同理心。慢慢她会跟居委干部,尤其是和综治干部谈他们合作的好处。后来怡姝发现阿林“义务献血”这个事情,就让阿林到他所在的社区去献血,而不要到其他地方去。这样就帮助本社区居委会完成一个献血的指标。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有三种类型: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和混合型关系(黄光国,2004)。混合型关系遵循着人情法则,这包括“欠人情”作为交易的资源和社会规范,而规范包括平时以各种方式保持联系和困难时候帮助(黄光国、胡先缙,2005:166)。怡姝与居委会之间保持着平时的走动与联系,通过阿林献血实现“欠人情”,这是中国式的“拉关系”。这种人际互动改善了阿林与社区居委干部之间的关系。之后,怡姝社工利用阿林献血的事情为阿林争取了一个司法奖励,又将阿林获得司法奖励的进步跟居委干部讲,居委对阿林的态度就彻底转变了,对阿林的支持也多了起来。这样,社工就打通了阿林与社区居委干部之间“关系链”的问题,疏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后续社工又借助献血事件和家庭社会工作服务,

促进了阿林家庭关系的融洽。阿林之后通过社区的积极推荐得到了一个就业机会。由此阿林的整个关系网络重新焕发活力,进入良性运转轨道。

(三) 关系网络的干预

案主阿钦,30多岁,多年吸毒,因为贩卖毒品而判刑进行社区矫正。其家人只是给予他物质上的帮助,父亲平时对他很冷落,缺乏情感上的关怀。阿钦回到社区后,常常感觉生活无聊,又重新想去寻找以往的不良朋友。

(案例3基本情况)

对阿钦的关系网络评估发现,阿钦自身虽然愿意积极回归社会,但家庭给予他的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过于弱小。但在吸毒的朋友圈,阿钦则扮演者老大的角色,自我感觉良好,吸引力强。这样阿钦的不良朋辈关系网络和家庭关系网络间存在力量的抗争,不良朋辈关系在发出“拉”的力量,而家庭关系网络发出“推”力量或者不抗衡,阿钦容易进入不良团体,再次吸毒。社工的做法是增进家庭“拉”的力量,通过对阿钦父亲的教育,强化家庭的鼓励和支持。同时,社工还帮助阿钦进入了两个正向的朋友圈,一个是戒毒同伴教育小组,一个是篮球队,提供同伴支持。阿钦提到,他投三分球很准的,球友们留了联系方式常叫他凑人数打球玩。他逐渐就不去吸毒了,怕吸毒伤身体直接影响打球,在球友面前丢面子。所以,他也会去戒毒同伴教育小组,学习大家戒毒的经验,用在自己身上,逐渐就对原来的吸毒朋友圈没有兴趣了。

正如杨国枢(1993)指出的,顾虑人意、顺从他人、重视名誉是中国人他人取向的重要表现。由于阿钦好面子、重视名声的特点,因此很珍惜球友们对他投三分球的评价,为了这个声誉,阿钦对吸毒有所忌惮。同时,再加上戒毒同伴教育小组的教育以及家庭的支持,阿钦的关系网络再次实现平衡。

(四) 关系世界的干预

做久了就会发现,就业问题是案主回归社会的关键因素,但是就业本来就难,何况是这些矫正对象。几年前,我们工作组常常讨论这个问题,想着怎么解决,最后希望制度上能够有所改变。我们把就业政策的建议提交给本区工作站站长,而站长则提交给市级层

面的总站,反馈给政府部门。每次专家督导见面,大家也都会提及就业政策问题,通过这些专家反映给上海市政府部门。现在是稍微好一点,09年市级层面就出了一个文件《关于2009年加强就业援助稳定就业局势的若干意见》,吸纳就业的单位政府会给补贴。我们总站也因此成立一个就业服务社。(访谈对象社工鸣翔)

对案主关系网络的干预有时候还需要介入“关系世界”。社工鸣翔对政府提供就业政策支持的建议已经触及到了“关系世界”的层面。关系世界的改变是社会结构的变革。鸣翔的干预适应目前政治体制特点,利用了既有的政策建言渠道。他通过社区矫正工作组的集体讨论层层上报,反馈给政府部门,寻求政策的变革。国内,高校专家联结着政府、社会组织,是相关政策、制度设计与变革的倡导者。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既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也首先是学界不断与政界互动倡导的结果。高校的社会工作专家在社会工作界、政界都具有话语权,争取他们的支持与理解是社会工作倡导的重要方式。鸣翔通过专家督导来反映政策的诉求,适合于中国的现状。最终,上海在制度上设计了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吸纳矫正对象就业。这是包括鸣翔等诸多社工、教育界和政府部门努力的结果,反映了社会工作在推进结构变革层面的作为。

初步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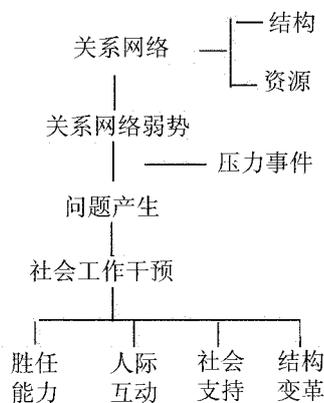


图3 社会工作关系实践框架图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初步的社

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实践框架(见图3)。根据“人是关系性存在”这一哲学判断,我们对案主的认识是围绕关系性存在这一假设的。在实践中,要基于关系对案主进行评估。群体的关系网络在结构和资源上表现为关系网络的弱势。在面对压力事件中,弱势的关系网络无法有效地应对风险,呈现关系网络的不平衡,从而产生了问题。社会工作者聚焦于案主的关系网络,通过展开对案主的胜任能力建设、人际互动干预、社会支持动员、结构变革来回答案主的需求。

社会工作的关系实践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脉络,这显示了文化敏感性的意义。一方面我们需要科学的知识来回答案主的问题;另一方面,本土实践中,国人行动中的人情、面子、权威取向,关系取向以及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等还需要社会工作者有着充分的文化自觉。在社会转型阶段,中国总体上还是情理并重的社会,情感因素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过渡时期的社会工作无法排斥情感因素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尤其重视“情理法”的兼容。此外,实践中整合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从个体的关系网络以至关系世界的整体改变等表现出了社会工作的综融性,而这不仅需要西方科学知识的支持,也需要本土实践智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也体现了艺术性。社会工作对“关系世界”的关怀是适应本土政治文化和体制的行动,在这个层面来说社会工作也是政治性的。由此,我们需要对习以为常的本土文化有着自知之明,彰显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进而强化汲取本土资源、服务案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 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 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
5.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台北心里出版社,2009年。
6. 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党政干部参考》2005年第7期。
8. 何友晖、彭泗清《方法论的关系论及其在中西文化中的应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9. 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 何雪松《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学海》2015年第3期。
11. 哈里·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李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 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 帕梅拉·特里维西克等《社会工作技巧实践手册》,肖莉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5. 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彭凯平、刘文静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16. 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
17. 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9. 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20. Bian, Yanjie.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1. pp. 275-295.
21. Eric Berne. *Transactional Analysis in Psychotherapy*. Sovenir Press Ltd, 1975.
22. Fabio Folgheraiter. *Relational Social Work: Toward Networking and Societal Practices*.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Ltd, 2004.
23. Freedberg. *Relational Theory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 Feminist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08.
24. Freedberg. *Relational theory for clinical practice*. Routledge, 2015.
25. Randall Collins.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Rosenberger, J. *Relat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Diverse Populations: A Relational Approach*. Springer-Verlag, 2014.
27. Smith, M., Doel, M., Cooper, D. *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Practice*. Jessica Kingsley, 2015.

作者简介:杨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andrewchaoyang@hotmail.com; 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7

(责任编辑:毕素华)